

毛泽东

毛泽东与政要交往书系

与

季国平 著

郭沫若





1945年8月28日，郭沫若(左三)等在重庆机场迎接从延安来重庆与蒋介石举行国共合作谈判的毛泽东。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郭沫若和民主党派负责人在西苑机场迎接毛泽东。



毛泽东与郭沫若等在西苑机场合影



1949年7月2日，毛泽东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向大会祝贺并讲话。这是毛泽东与郭沫若、周扬、茅盾在主席台上。



1958年春，郭沫若陪同毛泽东参观中国科学院科研成果展览。



1964年8月23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北京科学研讨会”的各国科学家时和郭沫若在休息室交谈。

前言

毛泽东与郭沫若，一个是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伟人，一个是中国现代文化舞台上光辉灿烂的巨星。他们共同经历了摧毁旧中国、创造新中国的伟大革命，他们同是中国社会走向进步的桥梁，他们都是中国人民的骄子。

毛泽东与郭沫若交往的纽带，是他们对人民的深爱和对民族的赤诚，是他们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追求，是他们笔下的诗和他们胸中涌动着的浪漫激情。

中国革命的战争年代，从来都有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一条是军事战线上的斗争，一条是文化战线上的斗争。蒋介石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毛泽东更多地使用枪杆子战斗，郭沫若更多地使用笔杆子战

斗。他们在不同的战线上互相鼓舞、互相支持,用枪杆子和笔杆子谱写了一首动人心弦的革命史诗,创作了一曲并肩战斗的友谊颂歌。

新中国建立后,他们致力于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他们在诗词领域内的交往达到了高潮。尽管政治运动的风波在他们的交往中激起过种种震荡,但是,他们的友谊经受了历史的考验,并且已经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一部分。

毛泽东与郭沫若的交往,从一个侧面反映着中国革命的政治家与革命的文学家相结合的历史。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治革命对于进步知识分子的巨大影响;也可以看到,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对于革命的巨大支持。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重庆,毛泽东和郭沫若的握手,在某种程度上就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人与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他们的结合,赢得了中国的知识界、文化界,赢得了广大的群众,孤立了蒋介石。新中国建立后,郭沫若与毛泽东的关系,又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忠于共产党、紧跟伟大领袖的无限热忱。

若干有关毛泽东的生平著作,往往对毛泽东作为诗人、文学家的一面做了淡处理,而突出他在政治和军事指挥领域内的卓著表现;若干有关郭沫若的生平著作,则较多地把他作为文学家、史学家和诗人来看待,而对他的政治观点和革命经历缺少深入细致的探讨。毛泽东与郭沫若交往的研究与描述,或许能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在他们两人的交往中,毛泽东作为文学家和诗人的一面得到了充分的展示;郭沫若作为革命文化人的政治活动也得到了较全面的反映。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一个比较新的角度,进一步认识和评价毛泽东与郭沫若,并进而深切地感受中国革命与中国新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过程。

本书以历史为经，人物交往为纬，采取“分镜头”写真的手法，全面表现毛泽东与郭沫若这两个现代中国历史上重要人物的交往活动和友情发展。全书融情景描述、思想对比、人物评论为一体，力求向广大读者提供一部真实、生动、有益的作品。

目 录

1	第一章 五羊城下初相识”
2	●政治雄才与文学骄子
16	●“状貌如妇人好女”
28	●农讲所的课堂上
35	●笔的讨伐——《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45	●枪的反击——《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3	第二章 延安与重庆的回应
54	●“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63	●“临风思北地”
76	●悼其父而赞其子
83	●革命文化的新旗帜
98	●《甲申三百年祭》的双重效应
111	●延安吹来的文艺新风
120	第三章 山城重逢
121	●一身系天下之安危
128	●一块手表寄深情

目 录

137	●“你的《反正前后》，就像写我的生活一样”
147	●唱和《沁园春·雪》
160	●冉冉升起的红日
176	第四章 “太阳”与“雄鸡”
177	●拥抱新中国
190	●歌唱毛泽东
200	●《武训传》的褒与贬
213	●红学“小人物”与“大人物”
225	●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
235	●“双百”方针与《百花齐放》
246	第五章 浪漫诗人的切磋与交往
247	●“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
257	●请郭沫若同志“加以笔削”
270	●故地重游，吟唱井冈山
276	●“三打白骨精”的一唱三和
283	●从“沧海横流”到“只争朝夕”
291	●“诗词余事，泰山北斗”
301	●郭沫若解说毛泽东诗词年表
312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中的悲欢
313	●苦涩的“自焚”

322	●《李白与杜甫》的公案
333	●“劝君少骂秦始皇”
342	●最后的关怀与思念
350	后记
351	主要参考书目

第一章

五羊城下初相识

广州 别称“五羊”。相传古代有五仙人，乘五色羊执六穗而至此。一说战国时此地属楚，南海人高固任楚相，有五羊衔谷至其庭，因以为地名。

近代，人民革命风起云涌，广州已成为大革命的中心。昔日仙人漫游之城，今日革命者聚集之地。毛泽东和郭沫若在这里相会、相识了。

一个是来自“芙蓉之国”、韶山冲上屋场的政治雄才；

一个是来自“海棠香国”、乐山大佛脚下的文学骄子。

革命党人的外形似乎应是“魁梧奇伟”，但毛泽东却是“状貌如妇人好女”，“说话声音低而娓婉”——这是郭沫若叹为“奇迹”的最初印

象；文学骄子本应是文弱书生，但郭沫若却笔如刀剑，在大革命失败的紧要关头，向着国共合作的叛变者蒋介石投以猛烈的“匕首”——这是毛泽东与郭沫若心灵相通的开始。

这两位以革命救国为己任的战斗者，在大革命的高潮中相识、相知，随后在各自的岗位上，用枪和笔并肩作战。他们的思想和心灵时时相通，他们的敌人始终也是共同的敌人，他们在为人民革命事业的奋斗中增长着信任和友情。

●政治雄才与文学骄子

(一)

1893年12月26日，在湖南韶山冲上屋场一栋当地人称作“一担柴”式的房子里，诞生了一代伟人毛泽东。这里缺少四通八达的商业交流，显得闭塞、落后，包围在一种山野村民的文化氛围之中。然而，这里却拥有极为优美的自然风光。

韶山，位于湘潭、宁乡、湘乡三县交界处，这里重峦叠嶂，起伏绵延。在群山中“拔起一峰，高出云霄，为诸山之祖”，就是闻名遐迩的韶峰。韶峰又名仙女峰，山高陡峭，“绝顶才宽三五尺，此身如在九重天”，气势十分雄伟。古人有诗赞曰：“绕岫岚光凝欲滴，长风轻袅云烟侧。山涵五月六月寒，地拥千山万山碧。从来仙境称韶峰，笔削三山插天空。天下名山三百六，此是湘南第一龙。”

相传舜帝偕妃臣南巡荆州至此，被这里秀丽风光所吸引，乃令臣僚“奏韶乐九成”，引得“凤凰来朝”。“音召凤至”，韶山因此得名。清代韶山的一位布衣名士周定宁写了一篇著名的《韶山记》，上面说道：“韶山，楚南一名山也！介三湘而远七泽，发岳麓而控

东台。潆回地涌，水飞雪浪之花；九嶷天开，山横玉枕之案。绵亘百余里，蜿蜒来八面之龙……”

毛泽东就在这淳朴自然的山乡——韶山度过了自己的童年。他读了6年私塾，从读《三字经》《论语》《孟子》《诗经》开始，继而学习《春秋公羊传》《左传》《纲鉴易知录》等，接受了比较正统的封建式启蒙教育。

也许是地灵人杰，山川钟秀孕育出一代伟人和骄子。郭沫若也出生在风光秀丽的大渡河畔。

四川乐山位于大渡河流入岷江处的西南岸，在乡土志上被称为“海棠香国”，以风景秀丽而著称。古代文人每每赞叹“天下之山水在蜀，蜀之山水在嘉州”（乐山旧称嘉州）。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在游遍这里的山山水水之后，也写有“少年不愿万户侯，亦不愿识韩荆州；颇愿身为汉嘉守，载酒时作凌云游”的诗句，被历代传为佳话。

从乐山城沿大渡河向西南逆流而上，行70里，有一个名叫“沙湾”的集镇，那就是郭沫若的故乡。沙湾位于峨眉山下，大渡河畔，依山傍水，景色宜人。

郭家的背后横亘着雄伟的峨眉山第二峰，俗称“二峨”，又叫“绥山”；门前是湍急的大渡河，又称“沫水”。当地人总用“绥山毓秀，沫水钟灵”，来赞美自己的家乡。

1892年11月16日，郭沫若就诞生在这里。乳名“文豹”，据说是母亲受胎时，曾梦见一个小豹子突然咬着她左手的虎口；母亲怀他时已是第八胎，故小名又叫“八儿”。学名开贞，“开”是排行，“贞”是本名；号尚武。

“沫若”是1919年首次发表新诗时的笔名，取自家乡的两条河名：“沫”即沫水，是大渡河的古名；“若”即若水，是青衣江的古

名。以故乡的河流为笔名,不仅反映出郭沫若深深的乡恋情结,而且更表现出郭沫若自幼深受家乡美丽山水的熏陶,绥山的“毓秀”,沫水的“钟灵”,孕育了一代文豪。郭沫若也总把自己比作峨眉山上的一滴清泉,愿随着时代的激流而汇入奔腾的大海。

也许因为只比毛泽东大了一岁的缘故,郭沫若少年时代的生活与毛泽东相差不多。他5岁进私塾,学的也是《三字经》《千家诗》《易经》《书经》《周礼》《仪礼》等。

毛泽东和郭沫若,不仅出生的年代相近,家乡的山水秀美,童年的读书生活相仿,而且在少年时代的个性中还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叛逆的性格。

毛泽东的童年不是轻松快乐的乐章。他是在不断地“反抗”和“斗争”中走过来的。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在我们家里,辩证的斗争不断地发展着”。毛泽东的第一个“斗争”对象是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毛顺生脾气暴躁、专横,他一心想把毛泽东培养成像他一样勤勤恳恳、精于算计、发家致富的人,而他对孩子的教育却经常采用训斥与责打的方式。父子之间很少有感情的交流,磨擦与斗争却是不断。

毛泽东曾因在私塾堂里闹学,遭父亲毒打逃出家门三天。一次,因为当众与父亲顶嘴而被父亲追打,毛泽东跑到一个池塘边停下来,以跳水迫使父亲停止“追击”。后来,毛泽东曾很有意味地回忆这件事说:“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我从这件事认识到,当我用公开反抗的办法来保卫自己的权利的时候,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保持温顺的态度,他只会更多地打骂我。”^①

^①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页。

这种叛逆性格一直发展着。在学校,毛泽东始终是各种反抗风潮的带头人,他曾领头发动了湖南一师的驱除校长运动,被学校列入开除名单,后因教员们的劝阻才得免于开除,改为记大过处分。此后,他成长为一个旧社会的叛逆者,为改造中国和改造世界顽强奋斗!

郭沫若也从不讳言自己的叛逆性格。他出生时是脚先着地——倒着生的,用郭沫若自己的话来说:“这大约是我的一生成为了反逆者的第一步,或者也可以说我生到世间上来第一步便把路走错了。”(《我的童年》)这似乎有一种异乎寻常的象征:郭沫若天生就是宗法社会的逆子叛臣。

和毛泽东不同的是,郭沫若从小在比较开明的家庭环境中长大,较少封建礼教的束缚,但这同样造就了他的反逆性格。在他大哥考进成都东文学堂、五哥考进武备学堂后,一些新学的书籍像洪水一样地从成都流到郭家的私塾,郭沫若开始接受改良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的影响,对他的民主思想和反抗性格的培养起了重要作用。

在乐山读小学和中学期间,他直接感受到社会的黑暗和学校的腐败。学校教员和学监大多仍是一些封建迂腐之人,新文化的知识水平非常低,讲地理的把朝鲜说成在中国的南方,讲英文的不知所云,讲博物的把乌贼的嘴当成肛门,简直笑话百出,远远满足不了郭沫若强烈的求知欲望。

郭沫若内心苦闷,曾一度自暴自弃,放浪形骸,这加剧了他对社会和学校的叛逆心理,促使他向着闹事方面发展。在小学,他煽动学生罢课,要求星期六放假半天,被学校开除。在中学,他为同学与营防兵打架抱不平,又一次煽动罢课,结果被中学“斥退”。郭沫若后来自己也说:在学堂,“我是决定了以反对教员为宗旨

的，我已经把那种无嫌猜的儿童精神完全失掉了，学堂里的新旧先生我们差不多没有一个没有反对过的。”（《我的童年》）自然，这种学堂里的叛逆性只是学生对于社会环境不满的一种发泄，而郭沫若终于发展为一个反抗旧社会的勇敢斗士！

（二）

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和郭沫若，有着同样炽盛的求知欲望和同样刻苦的钻研精神，但是，他们在治学兴趣方面却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了。哲学与政治对于青年毛泽东产生了愈来愈大的吸引力；而文学与诗歌却使年轻的郭沫若一直沉迷其中，难以自拔。他们向着各自的方向迅速地发展着，成长着。

毛泽东极爱读书，但学堂的知识始终不是他关注的重点，他总是不断地扩大阅读范围，向着未知的领域进军。在私塾学堂里，毛泽东不喜欢那些经典的正史经书，却喜欢悄悄地偷读《精忠传》《水浒》《隋唐演义》《三国志》和《西游记》等野史小说。当时，这些书都是塾师们禁止看的。到了新式小学堂后，毛泽东对那些美术、音乐甚至数学等等的课程并不感兴趣，倒是热衷于诵读梁启超的《饮冰室全集》和《新民丛报》。

1912年秋，毛泽东从湖南第一中学退了学，决定自己独立学习。于是，他到湖南省立图书馆读了半年书。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订立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读书。我非常认真地坚持执行这个计划。我认为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对我是极有价值的。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中午我仅仅休息片刻，买两块米糕吃。这就是我每天的午餐。我每天在图书馆里一直阅读到闭馆的时候。”“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很多书，学